

黄子明

牛车水是新加坡华人史里，极富有代表性的一个历史文化区，有说不尽的文化记忆，研究不完的文化遗产。从晚清到二战，从新加坡独立初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时今日，有许多变迁以及万变中的不变，都很值得人们去回味与探究。这部拙作，主要只是结合了城市景观和戏曲文化等几个方面的脉络，来展现本地华人文化百多年来，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些抉择与妥协。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各界的兴趣，一同来发掘更多相类的文化史。

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假若三言两语概括之，往往只能流于片面。本书绝不是以教科书自居的牛车水历史，也不期望告诉大家，有哪一样民俗传统，可足以代表本地华人的文化认同，更不敢说要“灌输”什么价值观给年轻读者。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里，经年累月沉淀而成的，它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滋养，也是我们在大同世界里与他人交流时，作为一个本位的根据。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总会分出许多支流，随着人的创造力而趋于多样化，无所谓单一的正统；而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价值，也是多元的，绝不限于简单的经济或政治功能。这本书在诠释牛车水的文化价值之中，点出了有广东特色的俗文学、戏曲艺术等，但更不忘牛车水在清末民初时期或新加坡独立时期所见证过的，跟海外华人或是本土族群相关的历史。

笔者才疏学浅，这部书的完成自然不是一蹴而就，其中丰富的内容，实在有赖于他人的回忆或指点，自己只是为整本书做了构思、选材与分析，把不同的课题与故事拼凑成文字。作为个人踏入本地华社人文研究门槛的尝试，这一部图书也实在酝酿多时，所以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在此深怕顾此失彼。

以学术界方面来说，我首先感激的是，早期有幸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本科，为我的汉学知识和双语技能打下重要基础。后来在德国布兰登堡理工大学念了文化遗产学的硕士与博士，一些比较历史与跨文化对话的观点，也扩大了我的视野。约五年前，又很侥幸地，在南洋理工大学获得一个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得以在介于 Cultural Studies 和汉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寻求启发。从那个时候以来，给予我帮助的国内外学者实在太多太多，我就先感谢中文系、华裔馆和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各位老师：研究海外华侨华人，中国侨乡，东南亚华文教育等课题的现任中文系主任兼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及华裔馆馆长游俊豪副教授，研究移民社会学的前华裔馆馆长周敏教授，研究剧场与表演的柯思仁副教授，以及一同办过研讨会的衣若芬副教授，曲景毅副教授，关诗佩副教授等等。我初来作研究那年，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正好庆祝成立十周年，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联办了“学与思：国际汉学研讨会”，这里也感谢所长胡晓真教授很慷慨地分享了她研究明清叙事文学的心得，我后来为美国一家期刊写了关于《红楼梦》续书的一篇文章，全是这个缘由。而2017年，通过游老师的安排，我到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作访问研究，又得以和不少国内外学者交流，就为我进行与牛车水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

这次能够顺利出书，特别要感谢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研究东南亚华人的黄贤强副教授。清末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黄老师的

强项之一，所以由他来为这本书的内容把关，可说是再合适不过。而国大中文系的容世诚副教授，给予这本书很大的鼓励，我早期也是上他的中国戏曲课而受益。我还要感谢在国大执教多年的辜美高老师，启发了我对俗文学的认识，2016年又引领我进行报章文学的勘察，一同参加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而独立研究员林志强先生所搜集的清末戏班与戏院资料，更为这整本书提供了重要的论题线索。近年合作为文物局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Dr Vivienne Wee，又令我加深了对本地文化传承的反思。

接下来要感谢几位在牛车水居住过或活动过的本地文化界人物，为本书接受访问，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以前牛车水的生活环境与文艺气息：书法家徐祖樂先生，南华小学退休校长冯月桂女士，书法家杨昌泰先生，画家傅美珠女士等。今年95岁的徐老先生，热心公益，而慷慨为拙作题字，更令本书封面大为生辉。另外，书法家张有烁先生，又为本书提供了作品图像。更要感谢爱书人彭铭祥先生，在成书的过程中给予各方面的鼎力支持。这期间有机会认识前国立教育学院的梁荣基教授，还有王永炳副教授（今年惜已病故），也开拓了我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野。

本书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我个人寻根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此期间，也身历其境地参与了不少由本地民间团体所举办，跟广东文化或戏曲艺术有关的活动。这里要感谢冈州会馆，中山会馆，广惠肇碧山亭，广东会馆，光辉粤剧团，白桥粤语演讲会，八和会馆，敦煌剧坊，戏曲学院等等不同社交网络的许多戏曲界前辈和热爱传统文化的朋友，给予我的各种指点与帮助。感谢本地粤剧界的戚超群老师，卢眉桦老师和龚耀祥老师，令我对于粤剧粤曲的认识，茅塞顿开，也感谢在书里接受访问的多位戏曲前辈。感谢陶融儒乐社的李咏恩女士，提供照片。也感谢养正校友会，提供历史照片。还有很多热爱牛车水

优影振天声

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

和大小坡课题的文史工作者，如王振春先生和许永顺先生，以及其他前辈们所给予的启发与分享，都实在感激不尽。文化记忆，终究来自民间，但不分籍贯和族群。

最后不得不感谢的，自然是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所提供的资助，以及八方文化创作室（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的协力，令这本书顺利出版。各位热心推介本书的朋友，在此也先行多谢了。这部拙作是一个初次的尝试，诸多遗漏和谬误之处，还望社会各界人士的谅解与不吝赐教，期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和大家一起合作，拓展更多的记忆工程！

2019年11月